

战争困境与本土化尝试： 全面抗战时期福州麻风救治研究

周东华 吴佩佳

〔摘要〕 福建省是中国历史上麻风严重流行区域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前,福州麻风救治由西方教会力量主导,以福州东、西门麻风村为主,开展收容救助和福音传播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无差别轰炸、经济封锁以及两度侵占福州,造成西方医护撤离、邮路中断、通货膨胀等问题,致使福音医学麻风救治陷入困顿。被动因应的柴井医院麻风门诊逐渐从西方教会力量主导转向本土化。福州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与爱国华侨等力量在麻风救治经费筹集、医护以及管理模式等方面展开本土化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关键词〕 麻风救治 福州 战争困境 本土化 全面抗战时期

关于全面抗战时期日军侵略对中国麻风防治影响问题,已经引起一些学者关注。有研究指出,日军侵略给中国麻风防治带来破坏和消极影响;亦有学者分析“教会麻风院”和“国人自办麻风院”在沦陷时期的不同因应;还有学者注意到全面抗战时期日军统治下中国麻风防治状况。^①这些既有研究对推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麻风防治史富有启迪,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空间。一方面,日军对其尚未占领之中国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给当地麻风院、麻风村造成巨大破坏;另一方面,日军封锁造成诸多地区交通不畅,中外交流困难,甚至中断,影响到依赖外国津贴资助的麻风院、麻风村运作。全面抗战时期,日军对福州进行无差别轰炸和经济封锁,两度侵占福州,造成西方医护人员撤离、邮路中断、通货膨胀等问题,使当地麻风院、麻风村运行陷入困顿,也迫使麻风救治工作被动转向本土化。对此问题,学术界尚未有专题讨论。本文拟以英国万国麻风救济会馆藏福州档案为中心,探讨全面抗战时期在日军无差别轰炸、经济封锁和短暂占领的困境下福州如何开展麻风救治工作及本土化尝试。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西方教会力量主导的福州麻风救治

福州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历史上是麻风流行区域。福建自宋熙宁三年(1070)开始设立养济院、孤癩院和孤老院,收容麻风病人。^②明正德十三年(1518)西门外闽县养济院创办。同年,巡按御史周鹓又在福州东门外另建一院。^③乾隆年间,福州养济院继续设立,定额收容麻风,使其“月有米,岁有衣,禁其入城”。^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基督教随之进入福州。美国传教

① 江澄:《战前和抗战期间我国的麻风救治事业》,《中国麻风杂志》1996年第3期,第195—198页;崔军锋:《民国时期福州基督教慈善事业研究(1912—1949)》,福建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40页;藤野豊『戦争とハンセン病』、吉川弘文館、2010年、140—150頁;刘影:《福建:公共卫生与麻风防治(1912—2010)》,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周东华:《疾病、战争的共有历史:全面抗战时期国际公益组织与华中沦陷区的麻风救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②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卫生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2页。

③ 民国《闽侯县志》卷六十一《义举》,1933年刊本,第338页。

④ 乾隆《福建通志》卷十三《福州府》,清四库全书本,第992页。

士杨顺(Stephen Johnson)观察到福州东、西门外麻风游荡情形,推测“麻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不讲卫生,并且居住在气候温暖、潮湿和通风不良的地方而引起的”。^①1865年,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第二卷中特别强调,中国人建立麻风院的宗旨“不是为这些被迫隔离在里面的病人谋福利,为他们治疗,而是提供一个场所不让他们对正常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②卢公明的这种看法符合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将麻风污名化的认知,也进一步加深西方世界对中国人麻风污名观念的认定,从而凸显教会“疗灵”对麻风救治的作用。

在传播福音使命驱使下,英美教会势力将明清以来福州原有的东、西门麻风村进行改造。东门麻风村由美以美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合作办理。西门麻风村则由安立甘会负责,距离福州城约5公里,是福州最大的麻风村。1871年,安立甘会开始参与西门麻风村救治工作。^③据记载,1904年西门麻风村约有400名麻风。^④1910年9月,安立甘会在西门麻风村建“安日间”教堂进行传教和施医。1912年,安立甘会改称中华圣公会,以便传教。为降低生活成本,西门麻风村病患实际上与健康居民毗邻而居。^⑤福州正式口岸医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南台,定期访问西门麻风村进行麻风医治。^⑥1926年中华麻风救济会在上海成立后,中华麻风救济会福州分会于1927年10月7日成立,并进行了分会委员选举。^⑦

全面抗战爆发前,福州麻风救治困难重重。一方面,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麻风入住东、西门麻风村后,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模式。从医学治疗角度来看,直接在西门麻风村开展医疗工作不切实际。因为麻风们普遍抵制漫长且不适的治疗过程,认为治疗并不能给他们带去治愈希望,并且一旦接受治疗,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家人彻底抛弃,也会失去政府津贴。从外部条件来看,麻风村环境简陋,卫生条件恶劣,医疗资源严重不足。1930年,中华麻风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在福州考察时发现,福州市政建设进步迅速,但福州东、西门麻风村简陋污秽,与三年前几无差别。福州当局及地方人士亦未闻有何改良计划。中华麻风救济会福州分会每逢圣诞节提供的数百元之米粮杂物馈赠,对麻风救治如同杯水车薪。^⑧另一方面,万国麻风救济会虽然给予福州麻风救治补贴,但常常入不敷出。1935年,福州救治经费出现525元的亏空。^⑨到1936年底,亏空更大。按照法币改革后的汇率计算,福州方面仅治疗费半年就需要700元左右,万国麻风救济会每季度25英镑(约合法币472元)的汇款显然无法满足此项救治。因此,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主教恒约翰(Bishop John Hind)向万国麻风救济会提议将经费增加为每季度35英镑,并且如果汇率上升,所需拨款还要增加。^⑩

20世纪30年代初,主导福州麻风救治的教会力量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麻风收容治疗机构,但各方因购置建设麻风院的土地资金及其所属权、使用权、管理制度以及政府拨款等问题争执不下。另外,政治局势、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也阻碍着救治工作。中华圣公会定期派遣传教士医生前往西门麻风村医治麻风,开展传教工作,其根本目的是践行教义和传播福音。中华麻风救济会和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等虽对福州麻风乱象有所考察和揭露,但援助力度有限。福州地方乡绅则更关注政治形

① “Notices of Fuhchau f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VI, No. 10, 1847, p. 494.

②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ir Religious, Governments, Educational and Business Customs and Opinions*, Vol. II.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65), pp. 254-259.

③ 《福州市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福州市宗教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④ W. M. White to Wellesley. C. Bailey, June 6, 1908, in Loyuan, China, 1908-1928, Box 37/12, The Mission to Lepers Inter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以下万国麻风救济会档案,不再注明馆藏地。

⑤ George Wilkinson to Wellesley C. Bailey, November 14, 1910, in Foochow, China, 1909-1928, Box 36/6.

⑥ William Muller to W. H. P. Anderson, March 6, 1929,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⑦ 沈志中:《福州分会组织之经过情形》,《麻疯季刊》1927年第1卷第1期,第42—46页。

⑧ 邬志坚:《华南及非列宾游记》,《麻疯季刊》1930年第4卷第2期,第21—22页。

⑨ Margaret Ellen Baldwin to W. M. Hayward, March 22, 1936,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⑩ John Hind to W. H. P. Anderson, December 4, 1936,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势,认为应待政局稳定后再考虑麻风问题。此外,现实条件的限制以及麻风对西方医疗手段和基督教的抵触心理,使教会救治工作难以取得有效进展。

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均注意到福州麻风形势严峻,但麻风救治所需的人力物力非任何一方可独立承担。因此,中华圣公会、福州地方政府及乡绅等各方力量经过近五年的接触与协商达成共识,拟于1937年2月在福州建立一个麻风救治中心。^①2月26日,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与万国麻风救济会首倡,并联合中华麻风救济会福州分会与美国扶轮社,商定筹建麻风救治机构清心院(The Asylum of the Pure Heart)。各方一致同意清心院办院的目的是:“改善麻风患者的生活条件,教导他们学会自助,减轻他们身体上的病痛,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②这一办院宗旨,体现了教会主导下麻风救治“自治、自养、自传”的特点。根据各方协议,清心院成立后,中华麻风救济会福州分会负责清心院院长人选及其工资,美国扶轮社承担清心院募捐设备和活动经费,万国麻风救济会赞助清心院医疗宗教工作以及维修基金。据当时估算,清心院内麻风的补助费每人每年约为50元,麻风在院内应种植蔬菜和大米,以为补贴。^③

清心院的筹建涉及万国麻风救济会、中华圣公会、中华麻风救济会福州分会和美国扶轮社等教会力量和社会组织。在协商过程中,各方分歧不断。万国麻风救济会总干事安德森(W.H.P.Anderson)致信驻远东办事处医学顾问马雅各(James L.Maxwell),坦陈根据他1925年在西门麻风村考察所得,在东门麻风村筹建新麻风救治中心的提议不可取。安德森曾与恒约翰沟通,得知其亦持相同意见,主张中华圣公会联合万国麻风救济会依旧在西门麻风村开展麻风救治工作。^④马雅各则认为应将所有居住在东门的麻风转移到西门麻风村,以便将整个东门麻风村场地转交给教会,筹建新的麻风救治中心。^⑤各方分歧导致清心院筹建工作进展缓慢。对此,传教士医生黄约翰(John L.A.Webster)称:“很多人想分一杯羹,但又在等其他人行行动,导致福州麻风救治工作止步不前。”^⑥当各方讨论清心院选址,在下河岛屿、上河兵工厂、西门麻风村邻近地点和东门麻风村几处难以抉择之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福州清心院计划因时局关系无形停顿”。^⑦不幸中的万幸是,清心院原定计划中与柴井医院合作开展麻风门诊的提议得以实施。

柴井医院位于福州北门,由英国圣公会于1898年创办。该会派遣宫维贤医生(Dr.George Wilkinson)担任第一任院长。起初医院只设立女子部门,1905年设立男子部门。在宫维贤院长和宝韦护士长(Miss Margaret Ellen Baldwin,时人称为宝琳师姑)的努力下,第一间男性病房于1910年建成,结核病疗养院和女性病房于1927年至1928年建成。1929年医院正式定名为柴井医院(Cha-Cang Christ's Hospital),私人病房区在1936年建成,床位增至150张。^⑧可以说,全面抗战爆发前,柴井医院已发展为福州医疗设备最好、规模最大的西医医院。^⑨

由于同属圣公会,柴井医院在创立之初便与圣公会福建教区联系密切。早在20世纪20年代,宫维贤院长与福建教区的来往信件显示,双方都倾向于在西门外购置土地,筹建全新的、专门治疗麻风的医院。^⑩此后,圣公会在西门外购置土地,并就麻风医院建造资金、医护人员、医疗设备和管理制度等与柴

① Proposed Leper Colony, December 7, 1936,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② Constitution of Board of Directors, Asylum of the Pure Heart, February 26, 1937,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③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Asylum of the Pure Heart, February 26, 1937,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④ W. H. P. Anderson to James L. Maxwell, April 13, 1937, in Far East Secretary for 1937-1938, Box 32/2.

⑤ James L. Maxwell to W. H. P. Anderson, May 15, 1937, in Far East Secretary for 1937-1938, Box 32/2.

⑥ John L. A. Webster to W. H. P. Anderson, April 28, 1937,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⑦ 《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三十届议会报告书》(1940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资料室藏,第73页。以下引用该系列报告书不再注明藏所。

⑧ Hospital Report for 1948,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⑨ 郑拔驾:《福州旅行指南》第六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0页。

⑩ Foochow, China, 1909-1928, Box 36/6.

井医院进行协商。在此过程中,柴井医院对前往就医的零散麻风进行治疗。1935年,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和万国麻风救济会开始商讨与柴井医院合作开展麻风救治。^①1935年至1936年,万国麻风救济会每年寄往福建教区的100英镑救治汇款中,有不少于30英镑是专门分拨给柴井医院开设麻风门诊所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安德森总干事在写给马雅各医生的信中指出,与其耗费经费与人力物力修建全新的麻风示范村,不如交由柴井医院进行病人住院与管理工。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恒约翰在给安德森总干事的信中提到,清心院计划受日军侵华冲击而被搁置,几乎不可能再有进展。故中华圣公会与万国麻风救济会将麻风救治事业委托于柴井医院,给予医院资助,使其能继续开展工作,甚至扩大麻风门诊规模。^③在各方确认柴井医院为福州麻风医疗中心后,万国麻风救济会于1937年11月寄出110英镑麻风救治支票,作为柴井医院救治麻风的医疗经费。^④这表明,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尚未祸及福州时,福州麻风救治由西方教会主导,柴井医院在战前便已开设的麻风门诊是福州麻风救治医疗中心。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西方教会力量主导福州麻风救治的困境

全面抗战爆发后,福州虽未沦陷,但已开始遭受日军轰炸。1938年5月,日军占领厦门,日舰来往于闽江口,阻断了福建进出口邮件的海上通道,也影响了福州海外经费汇入。日军经济封锁造成福州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1938年7月,万国麻风救济会按照惯例向福州寄出每季度25英镑的麻风救治经费,并申明这项定期经费是用于维持柴井医院麻风门诊的开设;如果门诊难以为继,则万国麻风救济会只能把经费转移至西门麻风村的救治工作。^⑤8月,受通货膨胀影响,福州方面请求增加麻风救治补助金额,万国麻风救济会给福州额外汇寄36英镑麻风救治补贴款。^⑥日军轰炸和封锁造成福州物价进一步飞涨。1938年9月27日,《福建民报》报道:“棉纱每包涨价六十元,布每匹涨价二元。”^⑦万国麻风救济会这笔额外的补贴款,帮助福州麻风救治渡过了1938年难关。

1939年3月,万国麻风救济会派遣护士伊懿如(Ethel M.I.Izzard)从英国前往福州柴井医院支援。当时,日军增加空袭频次,不定时向福州城进行无差别轰炸,市民人心惶惶,政府多次敦促市民逃出市区。据伊懿如回忆,1939年4月21日上午8点,7架日机空袭福州城区,目标是柴井医院旁一所大型军事训练学校。轰炸持续了4个小时,有5枚炸弹落在济贫院,这所专门收容无依老人的济贫院顿时化为废墟。同时,炸弹爆炸引起的震动将柴井医院天花板震塌,也将医院窗户玻璃震碎。轰炸结束后,医生护士赶往济贫院帮忙,挖出被埋在废墟里的老人,发现其中3人已经死亡,其余7人后来又死去3人。^⑧《福建民报》对这一天的轰炸惨状也有所记载:“闽江口敌舰聚集。敌机昨狂炸福州,掷弹51枚,死伤数余,烧货仓2座,民房15幢。”^⑨日军无差别轰炸将柴井医院置于毁灭阴影,加深了医护和病人对战争的恐惧,更使得福州物价急剧上涨。仅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两个月内,福州大米价格就上涨6倍有余。^⑩

① W. H. P. Anderson to John L. A. Webster, March 6, 1935,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② W. H. P. Anderson to James L. Maxwell, June 22, 1937, in Far East Secretary for 1937-1938, Box 32/2.

③ John Hind to W. H. P. Anderson, September 24, 1937,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④ John Hind to W. H. P. Anderson, November 15, 1937,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⑤ William Muller to John L. A. Webster, July 21, 1938,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⑥ John Hind to W. M. Hayward, August 30, 1938,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⑦ 《土布棉纱均涨价》,《福建民报》,1938年9月27日,第2版。

⑧ Ethel M. I. Izzard's Letter, August 14, 1939,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⑨ 《闽江口敌舰聚集,敌机昨狂炸福州》,《福建民报》,1939年4月22日,第4版。

⑩ Ethel M. I. Izzard to W. H. P. Anderson, 27 February, 1940,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物价进一步高涨迫使福州方面请求万国麻风救济会予以更多援助。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报告书显示,“近日百物昂贵,请各支部会计设法津贴各麻风院传道两个月之月薪,并请总会会计函请英国伦敦麻风会增加补助”。^①由于日军并未占领福州,此时仍能收到来自万国麻风救济会汇款。据统计,1939年1月收到50英镑,折合法币1371.42元,其中福州收到685.71元;2月收到75英镑,折合法币2149.25元,其中福州分配到1432.83元;3月收到一笔来源不明收入37.7元,全部分配给福州;5月收到22英镑,折合法币616.64元,未分配给福州;12月收到1717.21元,其中福州分配到1047.05元。^②这些补助款,再加上历年存款,确保1939年教会麻风救治机构如常运作,经费甚至有结余。例如,西门麻风村到1939年12月底经费剩余1368元,医院建设经费剩余3000多元,麻风诊所账户剩余969元。^③

全面抗战爆发后,教会主导下的福州麻风救治在日军封锁中艰难维系。原本以肺结核防治闻名当地的柴井医院,以原有麻风门诊为基础,围绕收治麻风、筹建麻风子女收容所和麻风福音生活等内容,积极开展麻风救治工作。

首先,继续为麻风开设门诊服务。早在1936年,麻风主动前往柴井医院就诊人数明显增加,每两周平均有20到30名麻风就诊。^④黄约翰医生在柴井医院提供的免费门诊治疗以及院内提供的免费餐食,是吸引穷困潦倒、无依无靠的麻风主动到医院门诊治疗的重要原因。大枫子油在20世纪20年代已逐渐普及,成为麻风治疗中最常见药品。柴井医院为麻风提供近乎免费的大枫子油注射治疗服务,吸引了诸多麻风前往门诊。根据黄约翰医生的记录,1937年柴井医院收容治疗的74名麻风中,有些早期麻风甚至主动要求一周注射两次大枫子油。^⑤1938年,柴井医院为82名麻风进行大枫子油注射治疗。^⑥大枫子油注射能够有效抑制麻风病情,使麻风重燃希望,也开始扭转“麻风不可治”的传统观念。

1939年起福州频繁遭到日军无差别轰炸,柴井医院仍坚持为因空袭受伤的市民和麻风提供医治。根据伊懿如护士寄往伦敦的信件所述,1939年柴井医院共收容65名麻风病患,每天开设两次麻风门诊,一次在早上进行,另一次在下午五点到七点。^⑦1940年,柴井医院因遭日军空袭被迫从北门搬迁到南台。据《晨光季刊》记载,医院仍然坚持每周开设两次麻风门诊,照常打大枫子油两次。^⑧

其次,为麻风子女等筹建育婴堂。1935年,黄约翰便意识到麻风救治应该关注如何使健康儿童免受患麻风父母感染的问题,提议设置专门隔离并照顾健康孩子的机构。^⑨但设想与实践之间差距甚大,尤其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各方麻风施救力量为筹建清心院而争论不休,这一提议不了了之。在教会为麻风健康幼童创设独立救济机构提议无疾而终时,闽侯县教育局在东门麻风村暂设痲子教养与疾民诊疗所,将麻风父母与其子女分开,单独教养。^⑩

在1939年4月21日空袭中,伊懿如护士等一行医护人员前往柴井医院附近的济贫院,救治遭受日军空袭的老人与幼童。老人恳请伊懿如护士将济贫院所有幼童带至柴井医院收养。经与院方协商,伊懿如护士将该院幼童带至柴井医院,临时安置于该院大会堂。为长久收养蒙难幼童和麻风健康子女,伊懿如于1939年8月14日致信万国麻风救济会总干事安德森,希望其能拨款资助柴井医院开设育婴

① 《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三十届议会报告书》(1940年2月),第72—73页。

② 《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三十届议会报告书》(1940年2月),第73—74页。受日军轰炸、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汇率波动较大。

③ W. H. P. Anderson to John. L. A. Webster, May 9, 1940,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④ Margaret Ellen Baldwin to W. M. Hayward, March 22, 1936,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⑤ John L. A. Webster to W. H. P. Anderson, April 28, 1937,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⑥ 《1938年福建教区医务科报告》,见《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二十九届议会报告书》(1939年2月),无页码。

⑦ Ethel M. I. Izzard's Letter, August 14, 1939. 另见《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三十届议会报告书》(1940年2月),无页码。

⑧ 《柴井女医院依然开业》,《晨光季刊》1940年第1卷第4期,第37页。

⑨ John L. A. Webster to W. H. P. Anderson, April 28, 1937,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⑩ 《麻风院实行合并》,《福建民报》,1937年10月1日,第4版。

堂。^①安德森对此提议积极回应,认为应将照顾孩子作为柴井医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②

1939年12月21日,安德森致信恒约翰,商讨育婴堂选址和建设经费问题。在育婴堂选址方面,安德森认为可以将育婴堂放在多年前圣公会在西门麻风村建造的房屋内。^③经费方面,恒约翰提出万国麻风救济会必须确保能够为育婴堂提供住宿费用。安德森认为这项工作很难由个别传教士完成,强调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和柴井医院就育婴堂问题达成合作前,万国麻风救济会不太可能为此提供经费资助,一旦两者达成合作,则万国麻风救济会愿意为孩子提供适度的住宿费用。^④在万国麻风救济会同意资助育婴堂开办费前,柴井医院只能在院内创设儿童保养所,将原先临时安置在大会堂的幼童和麻风健康子女一并收入保养所。

1940年6月,黄约翰医生致信安德森,为柴井医院筹建专门的儿童保养所申请资助。黄约翰称,柴井医院原准备选址建造单独楼房以收留被遗弃孩子和麻风健康子女,但日军无差别轰炸以及经济封锁造成福州物价飞涨,2月建房预算金额在6月已经翻了一番。因此,他特别提醒安德森,等到万国麻风救济会收到这封信并回复时,建房预算又将在6月份预算基础上再翻一番。^⑤安德森此前提议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与柴井医院合办育婴堂,在1940年也得到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慈善部积极回应。该部主动请设儿童保养所,专收麻风所生之儿女,“但是须得柴井医院董事部承认其事业乃隶属于该院”。^⑥此后,由于日军严控港口,封锁福州,加之福州两度沦陷,即便柴井医院同意与圣公会福建教区合作办理儿童保养所,也无法收到万国麻风救济会汇款资助。

最后,对麻风施以福音影响。全面抗战初期福州麻风治疗中心移到柴井医院后,西门麻风村的传道工作并未停止。传教士医生和护士定期为麻风村里的麻风举行礼拜活动,为皈依麻风办洗礼。在柴井医院,由于物资紧缺和大米价格飞涨,牧师和女圣经传道人每天分发100张饭票给院内患者。传道人在病人饭后教他们唱赞美诗,举行福音讲座,基本上每晚都按照这样的流程安排活动。^⑦农历春节时,柴井医院内麻风和其他患者大都归家过年,医院里的福音活动大大减少。因此,教会和医院将春节后一周定为大型福音活动周,以此吸引麻风和受伤市民参加。

在传统社会,麻风因外貌受到麻风杆菌侵蚀后畸变,通常被社会和家人遗弃,以乞讨为生,难以找到生活乐趣与希望,其性格往往变得孤僻或暴力。教会麻风救治工作的福音导向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麻风慰藉,柴井医院和麻风村内持续不断的福音活动也吸引不少麻风皈依基督教。邬志坚称,很多麻风在一年之中最期待圣诞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麻风院中受他们的无期徒刑,其精神的颓丧为何如?其生活的枯燥为何如?”圣诞这一日能够使他们被记得并且被予以热烈的同情,既享朵颐之福,又获温暖以御寒。^⑧传教士对麻风进行福音传播,是对他们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救赎”。重视受济者的福音生活,是教会慈善事业区别于中国传统施善行为的重要方面。

此外,麻风的日常生存技能也得以加强。关于麻风生活自助的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万国麻风救济会驻远东办事处医学顾问傅乐仁(Henry Fowler)便提出:“麻风被认为是‘懒人的疾病’,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保持身体与精神的活跃都是保持身体健康的条件。对麻风病患而言,更是如此。”^⑨圣公

① Ethel M. Izzard's Letter, August 14, 1939,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② W. H. P. Anderson to Ethel M. I. Izzard, December 21, 1939,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③ W. H. P. Anderson to John Hind, December 21, 1939,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④ W. H. P. Anderson to Ethel M. I. Izzard, December 21, 1939,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⑤ John. L. A. Webster to W. H. P. Anderson, June 1, 1940,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⑥ 《福建教区慈善部议案》,《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三十届议会报告书》(1940年2月),第72—73页。

⑦ Ethel M. I. Izzard's Letter, August 14, 1939,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⑧ 邬志坚:《圣诞对于麻风人的意义》,《晨光季刊》1940年第1卷第4期,第1页。

⑨ Henry Fowler, "Medical and construction page", *Leper Quarterly*, Vol. I, No. 3, 1927, p. 19.

会福建教区对西门麻风村的救济宗旨之一是教导麻风“自养”，即要求麻风在村里自己种植蔬菜、水稻等，以实现自给自足。

1941年4月18日，日军出动30架飞机对福州及闽江口两岸地区轮番轰炸。4月21日福州沦陷后，日军加剧对当地经济物资封锁，致使福州“款项冻结，现资不足，商业呆滞，生活高涨，无食者以万千计”。^①柴井医院损失惨重，大部分设备、病床、器械和药品被日军抢走，建筑被肆意毁坏，麻风病患与福州难民被迫逃亡。^②据统计，1938年圣公会收容麻风在院人数为157人，1940年为207人，而福州沦陷的当年骤降至88人。^③

1941年9月3日福州克复，闽江水上交通复航。中华圣公会联合柴井医院，努力在福州克复后重振麻风救治事业。但由于万国麻风救济会经费被切断，医院药品已经全部用尽，福州只能求助于中华麻风救济会，收到一些经费，勉强重启麻风救治工作。^④然而，日军持续的经济封锁以及福州短暂沦陷，导致教会麻风救治运行成本大大增加，甚至一度飙升到教会无力承担的地步。1944年福州传教士阿克赫斯特(D.K.Akehurst)牧师致万国麻风救济会继任总干事穆勒(A.William Muller)的信件显示，1937年到1944年福州物价涨了数十倍：

我们每天生活在物价上涨噩梦中。我们需要的津贴是战前(1937年前)传教士基本生活费的44倍(这仅仅是我们的基本需求，并没有追求任何奢侈物件)就可以看出发生了什么。一名传教士现在的花费相当于6年前整个福建传教士全年花费！物价已经飙升到令人绝望的地步：大米在战前卖10元一袋，现在则需要1300—1500元；以前6元一袋面粉被认为很贵，现在750元一袋却被抢购一空！我刚刚买了一套尽可能便宜的衣服，价格是2800元(约25英镑)，而7年前我购买婚礼西装只需要65元！^⑤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封锁及短暂沦陷等原因，福州物价不断上涨，依赖万国麻风救济会津贴资助的教会麻风救治事业，运营成本亦是与日俱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大对福建沿海封锁。在此状况下，万国麻风救济会与福州方面的通信汇款极不稳定，趋于停顿。对于福州教会麻风救治事业来说，万国麻风救济会资助被阻断后，柴井医院麻风门诊以及东、西门麻风村日常维系日渐困难。从1942年初开始，福州麻风救治事业在战争困境中不得不走向本土化。

三、战争困境中福州麻风救治的本土化

自清代以来，闽侯县政府一直给予福州东、西门麻风村定额补助。1934年，闽侯县政府鉴于此二麻风村管理混乱，曾下令整顿，“此后关于病故新收，亦着据实报告”。^⑥1937年，闽侯县教育局管理社会行政，“本由地方人士代行管理”的东、西门麻风村，“已由县府造册点交该局接收完妥”。^⑦1938年，福建卫生处发布推行麻风营养治疗公告，“省目前财政拮据，无法拨款治疗，卫生处近以麻风药品治疗外，亦可利用富于钙、维生素甲(A)及动物性食品加以营养治疗，业经由府令各县转饬各麻风院，利用麻风病患自己工作”。^⑧1939年4月，福建省卫生处处长陆涤寰视察福州东、西门麻风院，指示治疗注意事项，“拟

① 《福州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申报》，1941年6月16日，第5版。

② John L. A. Webster to W. H. P. Anderson, August 18, 1941,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③ 1938年、1940年、1941年福建教区麻风事业统计表，见《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二十九届议会报告书》(1939年2月)、《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三十一届议会报告书》(1941年2月)、《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三十二届议会报告书》(1942年2月)。

④ Ethel M. I. Izzard to W. H. P. Anderson, December 29, 1941,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⑤ D. K. Akehurst to A. William Muller, January 11, 1944,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⑥ 《闽侯县府整顿麻风院》，《福建民报》，1934年5月17日，第7版。

⑦ 《东西麻风院移归教育局接管》，《福建民报》，1937年5月30日，第7版。

⑧ 《推行麻风营养治疗》，《闽政月刊》1938年第3卷第2期，第48页。

将西疯院房舍,稍为整理”,并叮嘱麻风留心不要传染给子女。^①1940年,福州东、西门麻风村划归闽侯县卫生院管理。原来每名麻风每月0.45元的口粮难以维持温饱,闽侯县卫生院拟给东、西门麻风村约300余名麻风每月拨米两斗,余款用于购备柴薪、菜蔬等。^②与此同时,福州警察局加强对流浪麻风管制,发现麻风在外行乞者,立即送至闽侯县卫生院办理送入麻风院手续。^③闽侯县政府对麻风院也进行了整顿,一改过去麻风入院被“疯头”勒索的陋习,不收分文,对麻风兼施医治。政府派管理员分驻东、西两院,院内麻风每人每五日发米盐一次,并且专派医师逐日到院内诊治。^④在日军无差别轰炸困境中,闽侯县政府通过上述管理制度变革,整顿东、西门麻风村,使之不断本土化。

除变革管理制度外,地方政府还助推麻风门诊就医。麻风患者愿意到地方卫生院求诊就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多次颁发敦促麻风入院就医命令,并为麻风提供一定药品和生活用品资助。据《晨光季刊》记载,当地“以卫生院三令五申遇有麻风病患即遣送入东、西麻风院之故,病人乃绝迹其间,唯恐于路上为警察碰见而送入麻风院也。现福州整理卫生甚为进步,东、西(门)两麻风院归闽侯卫生院管理,该院已严令保甲长如发现是项疾民,即当遣送入院,以免传染。至东、西两麻风院一切陋习,亦已被卫生院悉除,革故鼎新,注重医药与教育”。^⑤1940年,福州卫生局发布公告,呼吁麻风感到不适,立即就医,不可拖延。^⑥

作为西医医院,柴井医院在麻风治疗问题上,主张以大枫子油注射治疗麻风的西医疗法,与福建中医采取传统的解毒利泻方法治疗麻风,大相径庭。柴井医院因西医诊疗经费短缺难以为继,接受西医训练的中国医生,开始尝试中西医结合治疗麻风。例如,黄约翰医生曾介绍一位潘姓福建籍外科医生加入柴井医院。^⑦在治疗麻风方面,潘医生尝试使用局部麻醉剂普鲁卡因(Novocain)辅助大枫子油注射治疗麻风,并在诊疗过程中根据麻风个例情况进行剂量调整。潘医生还结合中医针灸疗法,治疗麻风溃疡和疥疮,取得一定成效。此外,林秉忠、蔡平生、蔡景星、苏早祥、蔡仁世、张南、王元树、张方景、魏诚中等福建本省医生也参与麻风治疗。^⑧

在麻风护理方面,教会鼓励柴井护校学生加入战时麻风护理工作。圣公会于1905年创办柴井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后改名为私立柴井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37年,该校作为柴井医院一部分向政府注册,开始拥有独立的管理委员会。护士学校学制4年,前三年学习护理基础知识,第四年学习助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附属护士学校并未停止护士课程。当柴井医院护理人员不足时,在读女学生加入护理团队,定期为麻风测量体温,注射大枫子油,甚至为麻风孕妇接生,照顾健康婴儿。中国护士承担柴井医院护理任务,也预示着柴井医院在困境中的本土化。

1941年4月21日晚,福州沦陷,直至9月3日才克复。克复后的福州满目疮痍,难民待赈孔殷。振济委员会拨款10万元办理收容急赈,后因难民数量过多,又加拨30万元支援福清、长乐、连江一带的赈济工作。^⑨在教会力量受限之时,福建省振济委员会担起救治工作重任,福州沦陷前收容难民109691人,沦陷后收容逃出难民53788人,其中不乏麻风。^⑩

① 《榕麻风院》,《福建民报》,1939年4月19日,第4版。

② 《两麻风院改归县卫生院接管》,《福建民报》,1940年7月1日,第4版。

③ 《警局飭属取缔麻风》,《福建民报》,1940年10月11日,第4版。

④ 《县府整理麻风院》,《福建民报》,1940年10月14日,第4版。

⑤ 《柴井女医院依然开业》,《晨光季刊》1940年第1卷第4期,第37页。

⑥ 《积极防制麻风流布》,《闽政月刊》1940年第7卷第1期,第72页。

⑦ John L. A. Webster to W. H. P. Anderson, February 20, 1940,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⑧ 周宇辉、顾恒、严良斌:《中国现代麻风防治史(1949—2020)》,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240页。

⑨ 《振委会救济福州难民》,《申报》,1941年9月18日,第4版。

⑩ 《闽临参会讨论福州救济问题》,《大公报》(桂林),1941年9月25日,第4版。

1942年,福州市政筹备处飭令福州麻风院将在院疾民274人的名册上报,并对其进行接管。^①万国麻风救济会1943年度工作报告书提到,在救济会对未被日军侵占的国统区和部分抗日根据地增加拨款的同时,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又对麻风救治给予50%的补贴汇款。^②1943年11月起,福建省政府拟合并东、西门麻风村,筹设救治院。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巡查时,曾目睹麻风患者沿街乞食,于是下令自1944年起地方当局负责每日发给麻风口粮。^③11月26日,福建省政府将麻风村撤销,由救治院专派管理员二人处理东、西门麻风村事宜,并与万国红十字会福州麻风救治分会主任委员贝尔逊(Charles G. Pearson)讨论改善麻风生活。贝尔逊关注麻风问题,在他的推动下,红十字会急赈款10.8万元,福州每名麻风约获100元。^④此外,以曾出任福建省省长的萨镇冰与南洋华侨胡文虎为首的社会团体与慈善人士也热心麻风救治事业。胡文虎在香港征招麻风医生时规定,凡治愈一名麻风病人者由虎标永安堂发赏100元。^⑤福州麻风救治从全面抗战爆发前主要倚靠西方教会慈善汇款,转变为由政府、社会团体、爱国华侨共同发挥力量参与救治,经费来源与救治力量转向多元化和本土化。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变化,1944年上半年万国麻风救济会资助短暂恢复。福州收到312英镑资助,福建万国红十字会为柴井医院每位病人每天提供米饭、免费的盐与每月约100元的食物补助,并提供一定数量的布匹帮助麻风制衣过冬。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会计来必翰(W.P.W. Williams)在给万国麻风救济会的信件中提到,红十字会尤其地方政府补贴改变了福州麻风救治经费拮据情形。^⑥至1944年7月,福州救治院设立安老所、残废所、育幼所、游民所及麻风所等部门,收容麻风患者在内的各类人员591名,政府拨出48360元给救治院开展救治,依照人数核发口粮。至8月,收容人数不断增多,计安老所183名,残废所102名,育幼所49名,游民所149名,麻风所182名,合计已达665名。^⑦

就在福州麻风救治困境稍有缓解之际,日军再次占领福州。1944年10月4日,日军从大北岭和马尾两路会攻并占领福州,同时占领长乐,福州再度沦陷。11月11日,日军进一步扩大占领区,福州的公私房屋、防空工程、电线装置等被破坏殆尽。^⑧日军再次占领福州,令福州麻风救治事业又陷入经费困顿、药物紧缺的困境。柴井医院作为同盟国资产被日军侵占,工作人员被遣散,外籍人员被关押,中方院长刘钟福被日军扣押,折磨月余,第二年不治而亡。门诊麻风流离失所,万国麻风救济会津贴再次中断。

1945年后,欧洲战场胜利天平越来越倾向同盟国,英国本土战争压力骤减,万国麻风救济会开始恢复对世界其他地区麻风救治补贴。1945年4月,万国麻风救济会向福州寄出175英镑麻风救治款。^⑨1945年5月18日,福州完全克复。^⑩万国麻风救济会的款项恰好于此时汇到,纾解了麻风救治经费困难。抗战胜利后,柴井医院继任院长余文荣接受美国援华团救济,在废墟上重建医院,“以八百万之费用,经数周来之积极经营,该院各部门工作已大部修复,设备更见焕然一新。至病人之治疗,该院虽在艰苦过渡期中,亦仍照旧收容”。^⑪此外,鉴于福州沦陷时麻风散走,抗战胜利后福建省政府飭令省

① 《福建省政府对福州麻风病医院接管情形的指令》(1942年),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0006-001-001063。

② The Mission to Lepers, *Joy Triumphant: The Story of the Work For the Year 1943*, London, 1943, p. 4.

③ 《刘主席令榕市救济麻风患者》,《闽西日报》,1943年11月26日,第4版。

④ 《福建省政府对福州公立救治院麻风二院合并收容人数异动报告表及弃婴遍地情形的指令、代电》(1944年),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0006-001-001002。

⑤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卫生志》,第82页。

⑥ W. P. W. Williams to Donald Miller, June 20, 1944,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⑦ 《福建省政府对福州公立救治院麻风二院合并收容人数异动报告表及弃婴遍地情形的指令、代电》(1944年),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0006-001-001002。

⑧ 《福州等五市县沦陷损失调查》,《新福建》1945年第8卷第3期,第96页。

⑨ Donald Miller to D. K. Akehurst, April 11, 1945, in Foochow, China, 1929-1948, Box 115/3.

⑩ 《闽江两岸我军大捷,福州完全光复》,《时事新报》(重庆),1945年5月20日,第2版。

⑪ 《柴井医院重复旧观》,《中央日报》,1946年1月11日,第4版。

社会处一面扩大麻风收容院规模,一面予以麻风治疗,使麻风病菌不致传播。^①

总的来说,全面抗战时期日军无差别轰炸、经济封锁和两度占领福州,造成麻风救治经费捉襟见肘、药品无以为继、物资补给困难,战前由教会主导的麻风救治模式陷入困顿。在此情况下,福建省政府与闽侯县政府、地方乡绅、爱国人士等迎难而上,为困境中的福州麻风救治提供经费和物资等多重帮助,福州麻风救治经费来源与救治人员逐渐转向本土化。

结 语

鸦片战争后,福州成为通商五口之一。传教士随开埠进入福州,圣公会医疗传教士关注到福州麻风流行问题,开始施以援手,定期前往东、西门麻风村进行救治。然而,医疗传教士的救治成效不明显,麻风村混乱不堪,麻风流行依旧。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主教恒约翰向万国麻风救济会等各方教会势力提议筹建福州麻风救济中心,得到各方回应。1937年2月,开始筹建清心院。多方势力均有各自算盘,清心院计划推行缓慢。在各势力陷于选址争论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清心院计划戛然而止,惟万国麻风救济会资助柴井医院麻风门诊得以实现。全面抗战爆发后,福州在一段时间内是沿海唯一幸存未沦陷的城市,“从战事发生以来,凡我沿海重要城市,均已先后沦陷,硕果仅存者,惟福州而已”。^②福州虽然暂时得以幸免,但日军无差别轰炸和经济封锁,导致福州物价飞涨,在日军侵华攻势之下,拯救麻风病患这一“边缘群体”,面临诸多挑战。正如邬志坚指出:“最大的困难莫如经济,盖吾国所有的麻风院的经济,除本会津贴外,强半仰给外国,溯自战事爆发,交通断绝,国外的款项无法汇寄,此事影响之巨,我们不难想见,现在已有若干麻风院宣告解散,其余的在挣扎中。”^③1941年和1944年福州两度沦陷,进一步加剧了福州百姓生存困境。就麻风救治而言,福州麻风救治事业在“苦难”中开启本土化尝试。

首先,福州麻风救治力量复杂,中华圣公会、万国麻风救济会、美国扶轮社、福州卫生院和地方乡绅等各种力量纠葛,但占据主导的是圣公会和万国麻风救济会。全面抗战时期,福州麻风救治工作在日军无差别轰炸、经济封锁和短暂占领环境中开展。断断续续的中外交通阻隔、邮路不畅,使万国麻风救济会的援助经常中断,导致育婴堂项目、大枫子油采购以及麻风治疗条件受限,麻风救治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在此情况下,福建地方政府及乡绅等本土力量成为麻风救治主角,同时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医护人员由福建本地人士担任,福州麻风救治转向“苦难”的本土化尝试。

其次,全面抗战时期福州麻风救治事业可谓被动走向“本土化”。日军轰炸、封锁和短暂占领,在客观上促成福州麻风救治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化。麻风施救者逐渐以本土力量为主导,医治手段也开始呈现中西医结合趋势,经费来源不再一味依赖西方教会。福建省政府与闽侯县政府加大麻风救治力度,从经费和物资方面予以相当保障和支持。

最后,福州麻风救治中人道主义与福音立场之辩证关系。教会在麻风救济工作中对中国传统的慈善观念和施善方式有所突破,对麻风不以传统方式一味隔离,而是收容与救治并重,并注意培养麻风生活自理能力和重视病人精神世界。教会虽有贯彻基督教义的成分在内,但是这种“教养结合”的救济方式一定程度上调适了全面抗战时期福州的社会秩序,改善了麻风境遇。从这一角度来看,应该对教会麻风救治的人道主义予以肯定。但是从其开展救治目的来看,教会麻风救治工作本质上是基于基督宗教信仰的福音慈善事业,具有文化殖民特点,也应予以批判。

^① 《福建省政府对福州公立救治院麻风二院合并收容人数异动报告表及弃婴遍地情形的指令、代电》(1944年),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0006-001-001002。

^② 周宪文:《论人事》,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69页。

^③ 志:《一个极大的打击》,《麻疯季刊》1942年第16卷第1期,第1页。

全面抗战时期福州麻风救治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情况并不理想。在战争困境中,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以及柴井医院未能改变福州麻风流行状况,其收治麻风数量以及治疗效果都十分有限。福州麻风依然散居民间,游荡街头,求乞以维持生计。正如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舒展会督(C.B.R.Sargent)所言:“我们对麻风人的工作尤为低下,他们所受的待遇更为可怜……若我们的盲人和麻风者全看教會的救济,则他们将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①福州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启了麻风救治的本土化尝试,尽管麻风救治效果和范围有限,但不能低估其意义,毕竟麻风救治本土化已经启动,且不可逆。1949年后,中国政府以“人民卫生为人民”为基本理念,以“面向工农兵,积极预防”为基本政策,采取“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措施,麻风疗养院、麻风村和麻风巡回诊疗等多管齐下,仅用不到30年时间就基本控制麻风流行,用不到60年时间基本消灭麻风危害,凝练成麻风救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麻风病隔离防疫史料整理与研究(1368—1978)”(项目编号:20&ZD223)的阶段性成果。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吴佩佳: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蒋 梅]

^① 舒展:《我们的慈善部》,《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第三十三届议会(特别会)报告书》(1943年2月),第57—58页。